

共产主义观：继承、延续与统一

——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比较研究

杨雨帆，林 锋

摘 要：国内学界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形成了“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与“科学”的共产主义的对立。这种观点是对马克思思想进程的一种曲解。事实上，《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未来社会观的新探索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共产主义理论并非“截然不同”或“根本对立”，而是一脉相承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仅继承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主义观的基本思想，揭示出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现实力量以及现实途径，还延续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未来社会观的表述方式，通过对异质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阐明共产主义理论。另外，《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均立足于唯物史观、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阐发马克思主义的未来社会理论。准确地理解上述关系，有助于恢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主义观在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史上应有之历史地位，更加全面、透彻地领会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

关键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观；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A811.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23)02-0010-08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30223.001

一、走出所谓“《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德意志意识形态》 截然不同”的认识误区

长期以来，在国内外学界关于马克思共产主义观的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共产主义理论是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不成熟思想”，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的共产主义思想存在着重大原则性区别。

在国外学界尤其是在前苏联学界，《手稿》与《形态》的未来社会观往往是在“对立论”解读方式的语境下呈现的。法国学者科尔纽（Auguste Cornu）在《马克思的思想起源》一书中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仍然“以空想主义者的方式去看待与现存社会不同的新的社会的基本特征”^{[1](P78)}。与《手稿》不同，《形态》则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阐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苏联学者尼·拉宾（Николай Лапин）认为，《手稿》中共产主义理论的有些观点（譬如就废除异化劳动的先决条件即私有制而言）是不完整的、笼统的，而《形态》是1844年以后“完整科学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2](P339)}形成的阶段性成果，并且产生了“作为完整学说的马克思主义”^{[2](P340)}。苏联学者奥伊则尔曼（Теодор Ойзерман）则从“异化”概念出发指出：《形态》优于《手稿》的地方就在

作者简介：杨雨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2001111130@pku.edu.cn（北京100871）；林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于《形态》抛弃了“同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有联系的术语”^{[3](P468)}即“异化”,唯物主义地理解了共产主义的客观前提。日本学者城塚登梳理了《手稿》和《形态》的未来社会观,认为在《手稿》中“马克思这种共产主义的主张还是抽象的,仅仅指明了基本的方向”^{[4](P92)},《形态》则建立了唯物史观,彻底地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明确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阶级斗争以及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在国内学界,在《手稿》和《形态》共产主义观的关系问题上,大部分学者的观点也与上述看法同质。赵家祥和孙伯鍈都认为《手稿》的共产主义思想还不是科学的,如果按照“人的本质的异化和人的本质的复归的逻辑顺序”^{[5](P50)}阐述共产主义,只会导致本末倒置的唯心主义。对于《形态》,他们认为马克思此时已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彻底决裂,《形态》的未来社会观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史上的巨大进步。段忠桥在其文《唯物史观是政治哲学吗——与王新生教授商榷》中批驳了王新生用以论证共产主义既具历史必然性又具道义合理性的两个前提,表达了对《手稿》与《形态》共产主义理论关系的两个看法:其一,《形态》共产主义观与《手稿》共产主义观截然不同;其二,正如从人道主义角度理解《形态》未来社会观是荒唐之举一样,从唯物史观考察《手稿》讲的共产主义同样是无稽之谈。在第一个观点上,段忠桥认为与《手稿》共产主义观紧密相关的是人道主义,与《形态》共产主义观紧密相关的是唯物史观,将《手稿》与《形态》讲的共产主义置于互相对立的两极。在第二个观点上,他通过援引《形态》对“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否定态度”明确认为,不能从人道主义角度阐述共产主义^①。国内还有其他学者专辟篇目、多角度阐述《手稿》和《形态》未来社会观的关系。有学者明确指认,不同于《手稿》“建基于异化史观的基础之上”^[6]的共产主义观,《形态》的共产主义思想是“与伦理道德分道扬镳”并对“道德宣判死刑”^[6]的现实结论,是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论证出来的科学事实;从《手稿》到《形态》,是从哲学共产主义思想到“科学社会主义”^[7]和“经济共产主义”^[8]思想的转变。除了关注理论基础的研究视域外,还有立足于理论内涵、考察方式的比较分析,譬如将《手稿》的“人的本质的复归”与《形态》的“阶级联合”“阶级革命”、将《手稿》对两种形式的共产主义的批判和《形态》对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的批判等进行对比,认为《形态》是对《手稿》共产主义观的跃迁、升华与超越^②。

上述观点对我们了解学界部分论者对《手稿》和《形态》的定性是有帮助的。这些论者强调:唯物史观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界域和解释结构,人道主义是掩盖科学共产主义的屏障,不摒弃人本主义的概念、术语和思想,就不会形成科学的共产主义观。按照这种解读方式,以《手稿》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共产主义观是“不成熟”甚至“不科学”的。对于上述见解,笔者持不同看法,拙文认为《形态》的共产主义观是对《手稿》的未来社会观的继承和发展,绝非颠覆式的超越和断裂。

二、思想意蕴的继承:物质前提与无产阶级及其革命

事实上,《形态》的共产主义观与《手稿》的共产主义观并未产生断裂,它们都鲜明地揭示出

① 为此,段忠桥教授援引“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这句话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对实证共产主义的肯定以及对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的摒弃。参见段忠桥:《唯物史观是政治哲学吗——与王新生教授商榷》,《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年第3期。

② 参见陈曙光,余伟如:《共产主义思想:跃迁与升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德意志意识形态〉比较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实现未来社会的物质前提、现实力量以及现实途径。从这一层面上说,《形态》是对《手稿》未来社会理论的继承。

(一) 从以往全部财富的保存到“生产力总和”的遗留

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未来社会不是脱离人类的文明进程、凭空产生的空中楼阁,直接否定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物质文明成就的作法是简单偏颇、形而上学的,是建不成真正的理想社会的。他批判了“粗陋的共产主义者”^{[9](P184)}的平均主义原则,反对完全否定、直接摈弃业已生成的“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9](P184)}。在他看来,简单抛弃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文明成就并不是真正地扬弃私有制,而是向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9](P184)}。马克思还认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9](P192)}。在他看来,一方面,工人在工业生产中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到物质世界,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主体性;另一方面,心理学只有同工业相融通,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9](P193)}。工业是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载体,是展现人的主体性的有效形式。诚然,马克思并没有否认由工业导致的人的本质的异化事实,但这与其对工业成就的辩证态度并非不可兼容。

《形态》明确出发达的生产力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和基础。在对待历史每一阶段的物质财富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始终秉持科学的视角,坚持历史的眼光。在他们看来,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会“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9](P544)},这些物质成果无论是被后人所改变还是“预先规定新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9](P545)},它们都必然作为新的环境与新的历史阶段相融合。资本主义社会业已形成的物质财富在未来社会也发挥着同样作用。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实现未来社会、扬弃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需要两个前提条件:其一,大多数人成为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其二,无产者与资本家相对立。这两个条件又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9](P538)}为前提的。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一套“如果没有这种发展”^{[9](P538)}的假设话语体系,创意出一幅摈弃物质财富的图画:“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9](P538)}。如果离开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离开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材料和物质成果,就不可能消灭私有制。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9](P582)}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形态》是对《手稿》的直接继承和沿袭。

(二) 从“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到“共产主义革命”

《手稿》专辟篇目描述了私有制社会中工人的现状和地位,揭示出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一方面,就工人的工资而言,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工资数额极低。《手稿》指出,即使在对工人有利的社会状态下,工人的生存境遇并未根本改观,他们仍然持续面临“劳动过度和早死”^{[9](P121)}。工人的常态性贫困和死亡决定了其作为一个阶级而行动的革命彻底性。马克思描述道:“为了经受住新的竞争,已经降到最低限度的工资不得不进一步降低。而这就必然导致革命。”^{[9](P154)}另一方面,就工人的劳动而言,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领域中,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无限消耗自己的体力和脑力、高频次地感受精神的压抑和痛苦甚至于无法占有、享受自己创造的劳动成果。上述经济事实都明显地揭示出无产阶级是实现未来社会的现实力量。基于此,《手稿》明确指出“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9](P167)}即无产阶级革命是实现未来社会的途径,工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真正消灭私有制,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与《手稿》完全一致,《形态》认为,无产阶级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实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促使无产阶级产生,而无产阶级与生产力的紧密结合体现了该群体的先进性,“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9](P542)}。《形态》还总结

了无产阶级的其他特征,即作为处于社会最底层、受压榨最深的阶级而具有革命的彻底性、作为与资产阶级形成尖锐对立的阶级而具有革命对象的明确性。此外,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圣麦克斯(Max Stirner)时,还诉诸具体的经济事实揭示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他们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现实任务不是每天工作十四小时,而是“推翻整个资产阶级制度”^{[10](P327)}。《形态》还阐述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深刻蕴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必然性的意义。对无产阶级来说,革命是推翻统治阶级的唯一方式,“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9](P543)}即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决定了他们只有在革命中才能使自己获得解放,才能重建社会。就革命的目的而言,《形态》强调与从未消灭私有制的革命迥然不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9](P543)}。不仅如此,《形态》还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其他丰富的旨趣:实现普遍性的占有、推翻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和政治权力以及实现无产阶级的自身解放。

三、批判路径的延续:从“粗陋的共产主义”到“真正的社会主义”

《手稿》与《形态》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都在批判旧思想中阐发新思想,在对异质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中彰显马克思的未来社会观。《手稿》对错误思潮的批判所折射出来的共产主义观较之《形态》的共产主义观,二者就实质而言,并无任何“对立”之处。

在《手稿》中,马克思的未来社会观部分地反映在他对“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批判之中。与旨在实现“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9](P183)}的“粗陋的共产主义”相比,马克思指出真正的未来社会将摒弃“占有”的思维。“粗陋的共产主义”消灭的只是私有财产的形式,没有消灭利己主义动机支配的个体对私有财产的占有欲,没有消灭人们占有私有财产的思维逻辑,没有消除人们想把一切实物变成私有财产的强烈意愿,它只是“想把不能被所有的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都消灭”^{[9](P183)}。根据《手稿》的未来社会理论,共产主义社会扬弃了私有制的形式和实质,这不仅意味着作为制度的私有制被废除了,还意味着以占有、利己主义逻辑呈现的私有制观念也被彻底摒弃了。通过对“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批判,马克思还揭示出未来社会观的其他内容,譬如,未来社会摒弃平均主义的原则、肯定人的个性和才能的发展、坚持男女的平等地位等。

通过揭露、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唯心史观,《形态》对未来社会观的哲学基础即唯物史观予以高度肯定和评价。他们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把“人”和“真正的人”看作世界历史的最终目的,把货币和雇佣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的异化。诚然,“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也关心无产阶级的生存状态,但是,他们仅仅把无产者像机器一样的工作状态归结于食利者的腐化本质,把食利者的腐化本质归结于社会的野蛮化,把社会野蛮化最终归结于上帝。这种与立足于物质生产的唯物史观迥然不同的唯心史观,无法真正揭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也无法阐明无产者与资产者的尖锐对立。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是“用神圣的哲学语言说出这种关于无产者和食利者对立的滥调”^{[10](P547-548)}。他们混淆了文献的历史和现实的历史。在考察格律恩(Karl Grün)对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的批判时,马克思、恩格斯说道:“格律恩先生在这里把现实的生活关系说成是表现,而把宗教和政治说成是这些表现的基础和根源。”^{[10](P609)}上述引文表明,《形态》始终秉持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看待人类历史及未来社会^①。马克思、恩格斯注意到,“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惯用的抽象概念模糊了共产主义社会与私有制世界的界划,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者

^① 在《形态》第二卷中,马克思、恩格斯也对未来社会观的理论基础即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正面阐述,譬如:“真正的社会主义”标榜以“理性为基础”的理想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的意识和理性向来都是历史的产物。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67页。

的理论代表。马克思、恩格斯的未来社会观深刻地反映在他们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中：未来社会观不是以“理性”“意识的意识”“思维的思维”^{[10](P567)}为理论基础，不是把资本和劳动“完全放到最次要的地位”^{[10](P605)}，而是把唯物史观作为理论基础，把现实的经济状况和经济条件作为分析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的首要工具，进一步揭示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途径和力量。

对异质见解的批判是马克思揭示、阐明其理论精髓、核心要旨的重要一环。马克思在《手稿》的“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篇中批判“粗陋的共产主义”，《形态》则把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置为第二卷的核心内容。1844年前后马克思对异质思潮的关注与批判是一目了然的。应把他批判错误思潮时流露的重要观点联系、整合、统一起来加以把握，借以全面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及其进程，而不是用他一个阶段或一个文本中的思想来反对、排斥另一个阶段、另一个文本。

事实上，《形态》所揭示的未来社会观与《手稿》显现的未来社会观绝非不可兼容。《手稿》所展望的未来社会的诸多特征见之于其对“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批判之中。这些特征包括：不能离开物质文明的进程，要在物质财富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理想社会；破除财产分配的平均主义原则；摈弃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保证男女的平等地位以及充分肯定社会成员的个性和才能等。《形态》也阐述了未来社会观的核心要点。这里，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揭示了未来社会产生的物质前提、现实力量和现实途径，还揭示出未来社会旧式分工的消灭、人的个性与才能的全面发展等内容。《手稿》和《形态》的未来社会观在其理论要旨、核心观点上相互辉映、相互补充。二者的差异仅仅在于视角和具体内容的差异，而不在于观点上的根本对立。这些“视角”和“内容”都是马克思未来社会观理论体系的应有之义。

四、理论基础的统一：唯物史观与人道主义

(一) 唯物史观：《手稿》和《形态》共产主义观的哲学基础

对于上述学者提及的观点（《形态》的未来社会观之所以是对《手稿》未来社会观的“超越”，是因为二者在共产主义观的理论立足点上前判然有别，唯物史观是《形态》共产主义观的理论基石，而《手稿》则植根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唯心史观），笔者认为要厘清二者关系则需澄清：人本主义思想与唯物史观是否存在“必然”意义上的“不可兼容”？究竟如何把握、理解《手稿》与《形态》未来社会观体现的历史观？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通过正面构建和反向驳斥的双重论证阐明了他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观点。他提出：“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11](P278)}是判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准，在别的意义上使用这些用语只会造成混乱。施达克（Carl Nikolaus Starcke）就是从“别的意义”^{[11](P278)}即道德伦理、理想追求方面理解唯心主义，他之所以把费尔巴哈看作唯心主义者，是因为费尔巴哈具有追求理想的意图以及“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11](P286)}。对此，恩格斯直接批判施达克在唯心主义的标准上“找错了地方”^{[11](P285)}，并指出原因在于：其一，“道德理想就是唯心主义”这种看法是在哲学之外的“德国庸人”^{[11](P285)}中产生的；其二，如果个人对理想道德、意志动机的承认是其成为唯心主义者的条件，那么每个人就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11](P286)}，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交锋就成为哲学的伪命题；其三，哲学的历史证明：对理想信念的追求与唯心主义“绝对不相干”^{[11](P286)}。与恩格斯批判的情况相类似，施达克对“理想道德与唯心主义”关系的错误判断如今又以新的形式即“人本主义意味着唯心主义”呈现。这里，我们借用恩格斯的论证、质疑、反驳，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本主义不能等同于唯心史观，“是否人本主义”与“是否唯心主义”毫无联系，不能以此作为判定唯心史观的依据，人本主义与唯物史观也并不构成必然的对立，无论是唯心主义者还是唯物主义者都可以追求、信仰、实践

人道主义精神。

对于第二个问题,通过对《手稿》与《形态》的细致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二者都明确指出:人类历史是一部劳动演化史。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9](P196)}。在他看来,人类历史是由劳动(这里的“劳动”不是黑格尔哲学语境下的作为精神活动的劳动,而是现实中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生成和创造的历史,是通过劳动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在对国民经济学的经济事实进行研究之后,马克思重点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及其与私有财产的相互关系,提出必须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9](P167)}消灭私有制社会,扬弃异化劳动。同样,《形态》也把未来社会纳入劳动史观的视域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与无产者相分离,无产者“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而且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9](P580)};到了未来社会,无产阶级通过联合消灭私有制,使劳动向自主活动转化。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完整地阐述了以劳动为线索的人类历史即人类社会由低水平的自主活动过渡至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最后迈向高水平的自主活动。

(二) 人道主义:《手稿》和《形态》共产主义观的价值基础

在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的关系问题上,有学者指出:“共产主义的必然性不能、也无需由人道主义推出,更无需由人道主义说明论证,甚至也不需要人道主义去做描述”^[6]。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和科学的共产主义往往被置于互相隔绝、敌对的两极,《手稿》的共产主义观被指控“不成熟”“不科学”,而《形态》的未来社会观则被认为是科学的。事实上,马克思的一生致力于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他是极具人道主义情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共产主义理论始终贯穿着人道主义精神的价值特性。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马克思是否运用“人道主义”,而在于运用了什么性质的人道主义以及在何种意义上运用人道主义?在近几年的学术研究中,不少研究者对《手稿》的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频繁关注,频频用“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来否定《手稿》未来社会观的科学性。与之构成鲜明对照,很少有学者探究《形态》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思想。

通过细致的文本考察,笔者发现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是《形态》共产主义观的价值基础。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与他们的人本主义进行比较分析,指出二者存在着根本的不同。面对无产阶级“存在与本质”的冲突与矛盾,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要通过革命实践实现人的本质,实现如《手稿》所言的“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9](P185)},而不是“平心静气地忍受这种不幸”^{[9](P549)}。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无产者“在实践中,即通过革命使自己的‘存在’同自己的‘本质’协调一致”^{[9](P549)}。此外,笔者还在《形态》找到多处关涉马克思、恩格斯人道主义价值关怀的文本证据,限于篇幅,以下仅列举他们一些代表性的表述。在揭示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时,马克思、恩格斯就流露对无产阶级“非人”遭遇的怜悯和同情。在对无产者的现实境遇进行考察时,他们指出,无产者的“连他那些和大家一样的需要都不能满足;他每天必须像牛马一样工作十四小时;竞争使他降为物品,降为买卖的对象”^{[10](P326)}。与圣桑乔(Max Stirner)漠不关心的态度存在明显区别,马克思、恩格斯从人道主义角度揭示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者的符合人的本性的那些需要不被满足,因此无产者的革命是其合乎人性的职责,他的“任务倒是要推翻整个资产阶级制度”^{[10](P327)}。在《形态》的别处,马克思、恩格斯还立足分工与职业,描述了人道主义的未来社会观。他们指出:在私有制社会,分工强制规定了每个人特定的活动范围,个人始终是“猎人”“渔夫”“牧人”。基于此,他们展开了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畅想:“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会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

者。”^{[9](P537)}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分工严重压抑群众的艺术才能,而在未来社会,随着分工的消除,个人不再屈从于特定的艺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10](P460)}。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人道主义理念。

上述言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一度引发西方马克思学的讨论热潮,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至今仍在争论不休的问题:这种田园生活特征的共产主义是否与马克思一以贯之的科学观点(共产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机械化技术的基础上)相一致?在《政治性写作:后现代视野中的马克思形象》一书中,特雷尔·卡弗(Terrell Carver)将不同观点的学者分为四派:第一派认为这段话是“贫乏”“不切实际”的;第二派不担心渔猎和畜牧世界的技术的不发达状态,也不倾向于抛弃本段话中所描述的共产主义观点;第三派选择策略性转向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其他描述进行说明;第四派肯定这段论述与共产主义其他观点之间的明显矛盾,断定《形态》是断裂时期的著作^①。在笔者看来,无论是“策略性”的避讳问题还是用“断裂说”来剖析问题,这些学者实际上达成了—个隐性共识即人道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内容无涉的,他们没有认识到人道主义才是“田园式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研究者如果局限于唯物史观的理论界域和解释结构,他们便只能聚焦“畜牧”“打猎”“捕鱼”的经济意蕴,制造出以高度发达生产力为基础的共产主义与贫困共产主义的对立,给人一种似乎马克思、恩格斯的《形态》陷入“自相矛盾”的错觉,同时为其自身提供理论诠释的新空间(比如“认识论断裂”)。实际上,在关于共产主义的那段经典表述中,马克思、恩格斯的重心并非“田园生活”的经济形式,而是未来社会的价值特征。只有将人道主义作为剖析未来社会的重要价值维度,“田园”与“工业”的张力与矛盾才能和解。在笔者看来,“田园”共产主义论述恰好是马克思基于人道主义描述未来社会的有力证据。

追溯马克思的文本视野和理论旨趣,唯物史观和人道主义从来不是界限分明、互不兼容的两极,它们都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大背景下做出的,是在共产主义观的理论视域中展开的。要真正理解《手稿》和《形态》共产主义观的思想关系,就必须把唯物史观和人道主义看作马克思论证共产主义不可缺少的两个维度,而不是人为地把它们对立起来、割裂开来。

参考文献

- [1] [法]奥古斯特·科尔纽. 马克思的思想起源[M]. 王瑾,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 [2] [苏]尼·拉宾. 马克思的青年时代[M]. 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 [3] [苏]捷·伊·奥伊则尔曼.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M]. 潘培新,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
- [4] [日]城塚登. 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M]. 尚晶晶,李成鼎,等译校. 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
- [5] 赵家祥. 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变革之路[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 [6] 陈曙光,余伟如. 共产主义思想:跃迁与升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德意志意识形态》比较研究[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
- [7] 陈中奇.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共产主义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J]. 科学社会主义,2019(2).

^① 参见卡弗:《政治性写作:后现代视野中的马克思形象》,张秀琴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105页。

- [8] 刘同舫, 史英哲. 历史深处的未来想象——马克思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理论立场的转变[J]. 甘肃社会科学, 2014(1).
-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The View of Communism: Inheritance, Continuity and Unity

— Based on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and *The German Ideology*

YANG Yu-fan, LIN Feng

Abstract: Some Chinese scholars hold the view that there is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humanitarianism” communism and “scientific” communism as reflected in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and *The German Ideology*. This view is a misinterpretation of Marx’s ideological process. In fact, the communist theory of *The German Ideology* and the future social outlook of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are not “completely different” or “fundamentally opposite”, but come down in one continuous line. *The German Ideology* not only inherits the basic idea of the future social outlook in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that is, to reveal the material premise, realistic power and realistic approach in the realization of communism, but also continues the expression of the future social outlook in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that is, to clarify the theory of communism by criticizing the heterogeneous communism or socialist ideology. In addition, two books are both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humanitarianism, explaining the future social theory of Marxism. An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is relationship will help to restore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the communism view reflected in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and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Marx’s outlook on future society will be achieved.

Key words: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The German Ideology*; the view of communism; comparative study

(责任编辑 孙 洁)